首都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
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
(Social Sciences Edition)
2018 年第 4 期 (总第 243 期)
现代文学与报刊研究

左翼文学的自我调整与北方文坛的重振

——以报刊出版为线索(1932 - 1935 年)

黄艺红

摘 要: 1932 年 - 1935 年的中国文坛,在文艺论争繁多的现象之外,各派还存在着良好的互动、沟通和包容的一面。这其中主要的推动力,是来自左联内部的调整: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,以办刊的方式主动向左联外部寻求最大的认同基础,与除民族主义文学以外的非左翼文学发生对话,这不仅加强了南北作家之间的理解和交流,也在客观上促发北方文坛的重振。

关键词: 左翼文学;自我调整;北方文坛;报刊
中图分类号: I206.6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4 - 9142(2018)04 - 0115 - 07

一、文化废都:报刊中的 1930 年代初期北方文坛

1927 年,蒋介石发动"四·一二"政变,"国共合作"破裂。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,文坛的中心也随之南移。在鲁迅到上海之前,这座城市已有大批文化名人,1927 年 10 月鲁迅抵达上海,吸引更多的文学青年前来。1928 - 1929 年间,创造社、太阳社与鲁迅、茅盾等人展开关于"革命文学"的论争,此次论争使左翼文学思潮获得更广泛的关注,正如周扬所说:"这场论战,它的好处就是决定搞无产阶级文学;因为要搞无产阶级文学,就影响了很多青年参加革命。"[①]上海这座经济繁荣的南方城市,不仅吸引着有志于文学的青年,也吸引着愿为革命献身的青年。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文坛,其文学氛围也因此愈发活跃。

相较之下,北方文坛更显落寞。1926 年发生的"三·一八"惨案几乎开启了文人南下的潮流,鲁迅、胡适、徐志摩、林语堂等文化名人纷纷离京南下。6 月,张作霖、吴佩孚联合组建北京政府,政治的高压导致北京舆论空气之紧张,随后北新书局由北京南移上海,《京报》被封。1927 年,《现代评论》迁往上海,《语丝》被封后在上海复刊。1927 年前后终刊的北平刊物还有《沉钟》《甲寅》《猛进》《莽原》《清华

收稿日期:2018 - 05 - 24

作者简介:黄艺红,女,广西河池人,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,文学博士。(广西 桂林 541004)

① 赵浩生:《周扬笑谈历史功过》,《新文学史料》,1979 年第 2 期,第 231 页。

文艺》《狂飙》《晨报副刊》等。据统计,1924 年 11 月 - 1930 年 11 月间,全国共创办 64 份文学期刊,其中 48 份都在上海①,据《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》一书中的"1915 年 - 1930 年京沪期刊创刊示意图",上海可谓后来居上,势不可挡。到 1928 年,定期刊物数量甚至达到 60 种之多。② 而北京几乎从 1923 年起(也就是五四落潮以后),文学期刊无论是质或量的产出均处于低迷状态。据胡道静在 30 年代的统计,1933 年上海的杂志出版数量是 178 种,占全国主要地区总数的 70%,而北平仅有 9 种。③ 真正是"文化的天平已经彻底南倾,北京由万众瞩目的中心瞬间被抛向了政治文化的边缘,呈现出一片万物萧瑟的'废都'景象"④。

在此期间,北方比较有特色的刊物,当属 1930 年创刊的《骆驼草》(仅 1930 年一年,上海又有 25 份文学期刊面世)。该杂志如其刊名一样,为沉寂的北方文坛带来一抹令人惊喜的绿色,但因种种原因,《骆驼草》最后还是消失于文化沙漠之间,在创办当年即告停刊。这份聚集周作人、废名、冯至等名家,本意要"冲破沉闷的空气"、继承《语丝》传统的刊物尚且如此,更不用说其它由左翼青年学生创办的刊物,同样逃不过昙花一现之命运。当时的《出版消息》刊有一文:"偶然有一种比较前进的刊物如金丁等所编的《尖锐》在市场出现时,即昙花一见而归消灭,能够支持到三期以上而不被禁止者实不多见,结果是主持人物被捕或者流亡到外部去。"⑤这就足以说明左翼刊物的出版风险和困境。

翻看当时的报刊,对北平文坛的萧寂感到不满的文章,俯拾皆是:

故都确实是老了。到处布满了尘埃,真是看不到新气象。死寂,沉闷充溢在这座古城。文坛上偶尔的也能看到些零星的小刊物,然而不是空虚,就是太口号标语化。这古老的北平似乎是再也挣扎不起来似的。⑥

许多作家离开,留在此地的多半保持着静默的态度……北平文艺的园地已荒芜到不能再荒芜的地步;沉寂得使我们怀疑它已不存在。⑦

尤其在北平,满天飞着沙尘,真难看到天日,想找到使人满意的文艺刊物,更是难事。⑧

古老的北平,随着国都的南迁,一切的一切都显示着萧条,不景气;简直将要由古老走向死寂了!在文坛上,也是这样。⑨

北平文坛之不景气,实令人气煞闷煞!……在北平的所谓"文坛",没有一种定期的刊物,没有一种纯文艺的副刊,搜尽古城,你也绝不会找出一点文艺的活跃。⑩

在一切都暗自向下消沉了的北平,除了一两种报纸上的副刊之外,几乎没有一种定期刊物了。追怀往日的繁荣,真是如同隔了一个世纪。⑪

死寂与沉闷的空气占据了这座古老的城市……故都文艺界的"销落淹沉"不仅是我个人的观察,几乎近来这里的朋友没有一位不是这样异口同声地感叹着说:"民国十五六年的黄金时代是不会再来的了!"⑫

归结导致北方文坛沉寂的原因,大致有两个方面:首先,北方的出版业不及上海发达,书商与文人还

① 此数据由唐沅等编著的《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》第 2 卷、第 3 卷统计得出。唐沅等编:《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》(共 7 卷),北京:知识产权出版社,2010 年版。

② 刘增人等编:《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》,北京:新华出版社,2005 年版,第 4 页。

③ 转引自陈江、李治家:《三十年代的"杂志年"》,《编辑之友》,1991 年第 3 期,第 77 页。

④ 刘增人等编:《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》,北京:新华出版社,2005 年版,第 138 页。

⑤ 欧阳成:《介绍〈文学杂志〉》,《出版消息》,1933 年第 12 期,第 6 页。

⑥ 萧湘:《读者通讯》,《文艺月报》,1933 年一卷二号。

⑦ 苏欣:《笔讯·北平》,《文学》,1934 年三卷一号。

⑧ 编者:《编后》,《文艺月报》,1933 年一卷一号。

⑨ 欧伦:《读者通讯》,《文艺月报》,1933 年一卷二号。

⑩ 罗曼:《北平文坛之不景气》,《新垒》,1934 年一卷十号。

⑪ 烽柱:《我所见一九三〇年之几种刊物》,《文艺月刊》,1930 年一卷四号。

⑫ 萧然:《北平文艺界不景气的原因》,《平明杂志》,1933 年二卷十六号。

未达成像上海那样成熟的合作方式，书店或出版社更是缺少印行文学丛书或文学杂志的雄心，比如北新书局迁往上海之后，身居北京的周作人，出版其1930年代创作的文集，多选择北新书局等设在上海的出版社。其次，北方文坛的作家大量南迁，留守北平的文人主要注意力多集中在政治方面，当时比较有名的刊物如《独立评论》《再生》《鞭策》等几乎不刊登文艺作品。加之原本多产的作家因受到政局不稳的影响无法安心创作，又因为文学刊物的寥落，就算有作品他们也苦于无处刊登。于是，留居北平的文人有的高升，摇身一变为官僚，参与政事；有的退隐，安于教职，沉默不作一言，北方文坛的萧寂大体由此而来。

萧乾一直被认为是“京派”作家，然而在他的记忆中，开始动笔写作倒不是因为受到在北平学院派文人群体的影响，他的文学生命的开始，几乎是与北方文坛的告别消沉、走向繁荣同步的。他说：“30年代初期，北方知识界（尤其文艺青年）曾十分苦闷过。那时，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到了冀东，而掌权者仍不许谈抗战。一些后来当了汉奸的士大夫却在书斋里振笔大谈明清小品，提倡清静无为。1932年鲁迅先生到了北平，那就像窒息的暗室里射进一线曙光。1933年，从上海又来了巴金和郑振铎两位，死气沉沉的北平文艺界顿时活跃起来。他们通过办刊物（《文学季刊》和《水星》），同青年们广泛交起朋友。很幸运，我就是在那时开始写作的。”显然，萧乾此处“大谈明清小品”的“士大夫”所指的就是以周作人为中心的“言志派”文人圈子。只可惜在“救亡图存”的浪潮中，他们“提倡清静无为”的作品是如此地不合时宜，很难获得追求革命与进步的文学青年之共鸣。萧乾在文字中还提到促使北平文坛重新焕发生机最重要的两个事件：1932年鲁迅的北平之行，以及1933年郑振铎、巴金等人主编《文学季刊》和《水星》。这段话透露的潜在内容基本否定了流行观点所主张的：是“京派”文人群体重启北方文坛的繁荣这一说法。从这个角度出发，或许可以理解为：蔚为大观的“京派”文学研究，掩盖了北方左联为活跃北方文坛起到的积极作用。

二、北方左联“左”的纠偏：鲁迅北平之行的意义

1930年9月18日，北方左翼作家联盟于北平成立。上海左联是以鲁迅、茅盾等文坛前辈领衔，北方左联的盟员构成则以爱好文艺、要求革命的青年学生为主。但是，受当时共产党“左”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，北方左联与上海左联一样，在开展文艺工作时也犯过“左”倾的错误。在1930年11月28日通过的《中共北方局关于左联和文化运动等问题给保属特委的指示》中，就特别提到：“特委要有计划的帮助各地建立宣传队鼓动工作，如组织经常的宣传队（进行公开演讲，写标语等）、读报班（给不识字的人念报讲解）、游艺会（最好演新剧）、飞行集会等。”[①]鼓励盟员写标语、撒传单，走上街头参与革命运动——这些不符合革命实际的斗争行为，导致左联盟员的身份暴露甚至遭到捕杀，左翼力量损失惨重。据统计，到1933年10月，因为国民党当局对左派文艺的压迫，北平文总领导下的各社团成员只剩下不到100人。[②]

在文艺宣传方面，为压制全国范围内的左翼文化，1929年国民党中宣部制定《宣传品审查条例》；1930年12月公布《国民党政府出版法》；1931年10月制定《出版法施行细则》，11月，公布《宣传品审查标准》。以上条例均严格禁止左翼报纸、杂志、书籍的出版和发行。[③] 严酷的大环境之下，在文艺“沙漠化”的北方文坛办左翼刊物更是难上加难。创办北平左翼刊物的中坚力量主要是青年学生，他们多数来自当时的北平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、北平燕京大学、北平辅仁大学、北平法大平民学校、南开中学等。这些左翼青年冒着生命危险、集结多方力量，好不容易印出杂志，却一出刊就面临被查封的命运，如《夜

①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：《中共北方局关于左联和文化运动等问题给保属特委的指示》，《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》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91年版，第43页。

②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：《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》（第1卷）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11年版，第224页。

③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：《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》（第1卷）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11年版，第223页。

莺》《鏖尔》《转变》等左翼刊物仅出一期即被迫停刊，北方左联的机关刊物《北平文化》只出版三期就宣告夭折。几乎没有一份左翼刊物能长期刊行，且多为内部传阅，无法公开出版。

总之，对当时的北方左联来说，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文艺工作的开展，都异常艰难。学界普遍认为，1933 年 9 月沈从文接编《大公报 · 文艺》之举，首先打破北方文坛萧寂、冷落的文坛气息。其实，1933 年两份左联刊物《文学杂志》和《文艺月报》[①]的创办，在北方文坛引起的强烈反响不容忽视。从创刊过程和编刊理念来看，这两份刊物反映了北方左联对宗派主义、关门主义的纠正。日本学者近藤龙哉主张：《文学杂志》体现北方左联纠正关门主义的实践，具体时间是从 1932 年到 1933 年开始。[②]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并受到启发，试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。1932 年到 1933 年这个时间点，正是上海左联于《北斗》被禁之后，再度“出手不凡”创办《文学》，这个过程本身就体现上海左翼阵营对关门主义的调整与纠偏。上海左联与北方左联几乎同时以创刊的方式纠正“左”倾作风，这显然不是时间上的巧合。目下可见的资料都表明，北方左联的组织关系并不隶属于上海左联，那么北方左联是何时、经由何人、又是如何逐步修正“左”倾错误的？

如近藤龙哉所言，1932 年鲁迅的北平之行起到了关键作用。1932 年 11 月，鲁迅回北平探望生病的母亲，期间发表著名的“北平五讲”，并会见他在平的老朋友和部分左翼青年。据陆万美回忆，当时北方的左翼运动，党、团、群众团体，几乎毫无区别，一律发传单、写口号，参加飞行集会、游行示威，作为作家联盟，盟员反而不写文章——北平左联与上海左联犯过一样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错误。是鲁迅首先提议：北平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压迫手段和程度均不及南方，应该好好组织力量在北方办个长久的刊物，并叮嘱他们要纠正关门主义，团结进步作家，和培养新生的作家。[③]

鲁迅离平之后，仍与北方左翼青年保持联系，最终促成《文学杂志》的创办。鲁迅在给王志之的信中多次谈到编刊旨要，不但他自己写稿，为杂志拉来茅盾、艾芜、张天翼等上海左翼作家的稿件，还曾以周建人的名义，汇款资助《文学杂志》——这些在鲁迅的日记和信件中均有记载，也有当事人王志之的回忆。王志之是与鲁迅交流最多的北方左联成员。1936 年鲁迅逝世不久，王志之以含沙为笔名写成《鲁迅印想记》一书，还原了他与鲁迅的交流：

> 我立刻在皮包里取出自己的一本戏剧集《革命的前夜》送了过去：最近，北平的 × 联在他们的刊物上大骂我这本东西，说是我在同熊佛西梅兰芳他们争风，说是他们已经在群众中失掉了欺骗作用，我现在要企图来取而代之，骂我是什么什么新走狗。总之，简直把我当了他们唯一的死对头；同时，又遭到了当局的禁止……”。周先生翻开那本书，笑起来了：“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，不过，情形想得到是这样的，在上海也是一样。但，现在都有了改变，觉得动辄就显出一副凶恶的面孔，那是没有好处的；有些人，虽是不免有些错误，只要有好的倾向，我们就应该善意地批评，加强领导，最坏地是动辄就打击。”“他们没有想到批评的任务，也没有想到领导，”我不免生起气来了，“他们预先就定下了一个固定的模型，作品放进去，完全合，就好，不合，就打击。他们的本意也不在批评，是在挑剔别人的缺点来显示自己的前进，正确！[④]

这段文字透露两条讯息：其时的北平左联，不仅受关门主义路线影响（如排斥熊佛西等作家），在左联内部还盛行宗派主义作风，王志之与某些左联成员文艺观念不合就能说明这一点。而“他们”批判王志之的戏剧集，王志之的反批判也揭露当时北平左联创作，模式化、公式化之流行。鲁迅的回答亦包含两点内容：在上海也是一样，但现在有了改变；对于好的倾向，应当善意引导，而不是动辄打击。除了在

---

① 文学杂志社编：《文学杂志》，1933 年 4 月 15 日创刊，共四期（3、4 期合刊），西北书局发行；文艺月报社编：《文艺月报》，1933 年 6 月 1 日创刊，共三期（第 3 期由陈北欧、金谷主编），立达书局发行。

② ［日］近藤龙哉著，吉田薰译：《〈文学杂志〉、〈文艺月报〉与左联活动探赜——以北方左联克服“关门主义”的过程为中心》，《东岳论丛》，2011 年第 3 期，第 12 - 13 页。

③ 陆万美：《忆鲁迅会见北平左联的同志》，薛绥之主编：《鲁迅生平史料汇编》第 3 辑，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83 年版，第 576 页。

④ 含沙：《鲁迅印想记》，金汤书店，1936 年版，第 35 页。

北平的当面沟通，在致王志之的信件中，鲁迅也反复提到这一点：

我希望在平的刊物应以在平的作者为骨干，这才能够发展而且有特色，门类不完全一点倒不要紧。①

文章若大半须待此地，恐为难，因个人皆有琐事，不能各处执笔也。但北平现人心一时恐亦未必静，则待书店热心时再出，似亦无妨。②

第一期诚然有些"太板"，但加入的人们一多，就会活泼的。……我以为我们的态度还是缓和些的好。其实有一些人，即使并无大帮助，却并不怀着恶意，目前决不是敌人，倘若疾声厉色，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倒是我们的损失，也姑且不要太求全，因为求全责备，则有些人便远避了，坏一点的就来迎合，作违心之论，这样，就不但会有好文章，而且也是假朋友了。③

从这些书信可以看出，鲁迅对于北平左联如何吸收左翼力量、壮大左翼文学，可谓费心劳力。在当时，也就是1932年，有巨大影响力的杂志：上海的《文学》和《现代》还没有面世，北方文坛的定期刊物又少得可怜，所以，"《文学杂志》出刊后的影响是大的，到处都来函贿或写信给以赞扬鼓励"④。它的出现"象沙漠上的绿洲，震撼了当时沉寂的北方文坛"⑤。这份刊物署名王志之、潘训编辑，发表过鲁迅、茅盾、朱自清、郑振铎、丁玲、张天翼、艾芜、曹葆华、宋之的等人的作品，集合了南北两地作家。甚至可以把北平的《文学杂志》与上海的《北斗》，看作是遥相呼应的杂志——两者都是当地首次打破南北文坛藩篱的左联刊物。《北斗》与北平文坛的联系，是丁玲通过沈从文实现的，而《文学杂志》获得上海左翼作家的稿件，是王志之通过鲁迅和茅盾协调的，在鲁迅日记中也有相关记载："第二期既非我写些东西不可，日内当寄上一点。雁君见面时当一问。"⑥雁君即指茅盾。

从《文学杂志》发表的作品来看，无论是文学体裁还是题材，都呈现出丰富和多样的面貌。诗歌如哨夫《柏油路》、雪野《纪念丁玲》、木农《父与子》；小说如丁玲《无题》、澎岛《火灾》、艾芜《在茅草地》、陆绿曦《战士行》、宋之的《动荡中的北平》；散文随笔如鲁迅《听说梦》、茅盾《杂志办人》、张天翼《我的幼年生活》；戏剧如柳淘《校规》、左明和陈凝秋的《日出》、建地《命令：退却！第二道防线！》；文学理论研究如郑振铎《明代的"时曲"》、张松甫《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》、贺凯《汉赋的新解》；作家作品研究如朱自清《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》、陈均《喋血的诗人陈家梦》；还有韩君创作的歌曲《农夫叹五声》等，其选登的作品并不像典型的左联刊物那样强调斗争色彩，体现编者"用文学来鼓舞民族的精神！"⑦的办刊宗旨。

第一期《文学杂志》在《编后》对所刊作品的简要分析中，也清楚地说明其办刊旨要。比如，在评价致干的《没落贵族的诗人李长吉》一文说，"李长吉有一两篇'悯人'的诗，便说他是什么什么诗人，这种错误，在一些恶魔们懂得用'左'的方法来欺骗人的目前，更可看明白了。"这段话就是反驳过去某些左翼批评家，以是否具备革命性来衡量作品价值，以"左"倾的宗派主义对不革命的作家大加贬斥的风气。还有对《命令：退却！第二道防线！》和《动荡中的北平》两部作品的评价："从前，在只写工农才是革命的极左的倾向下，如后者这种作品是被抹杀的。现在大家都知道，革命是没有这般窄，而文学家也正须知道小资产阶级清算了作家才能前进。"这些字句表明北方左联纠正过去将文学"工具化"的作法，开始重视文学创作的审美艺术功能，真正做到"只要不站在大众底正反面的，只要是诚恳的写作，我们便都尽

① 鲁迅：《330109致王志之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2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359页。
② 鲁迅：《330202致王志之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2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365页。
③ 鲁迅：《330510致王志之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2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396页。
④ 陆万美：《迎着敌人的刺刀尖，坚持战斗的"北平左联"》，《左联回忆录》（下）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第608页。
⑤ 陈沂：《1931—1932年的北方左翼文化运动》，《左联回忆录》（下）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2年版，第575页。
⑥ 鲁迅：《330510致王志之》，《鲁迅全集》（第12卷）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396页。
⑦ 编者：《编后》，《文学杂志》，1933年一卷一号。

量登载。"[①]以当时的北方文坛来说,确实还没有哪份杂志拥有这样的气魄。

《文学杂志》的成功创办,倾注了鲁迅的关注和支持,随后出现的《文艺月报》也采取和《文学杂志》一样的编刊策略。由张盘石、陈北欧主编的《文艺月报》登载过鲁迅、茅盾、吴组缃、穆木天、金丁、陈北欧、张我军等人的作品。这份刊物在装帧、封面的设计和体例的编排上,很显然是模仿上海被查禁的左联刊物《文学月报》,且有意透露其左倾立场。《文艺月报》是北方左联纠正关门主义的产物,它比左翼色彩浓厚的上海《文学月报》更具开放性。在北平这样的文化沙漠之地,《文艺月报》的出现很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。据称:"《文艺月报》在出版的当天就卖了一百多份,这在当时北平的出版界简直是破天荒的事。"[②]第一期《文艺月报》的《编后》有这么一段自我检讨:"创作方面却不大使我们满意,内在的贫乏是生活不充实的表现。……不但我们要严酷的批判自己,我们更极虚心的接受所有指摘。这样,继续努力,我们向前进展。"[③]编者在这里表达了办刊物的决心:要纠正过去内容贫乏的标语口号化的文学、重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。

总之,"《文学杂志》出了三期,《文艺月报》出了两期。这在当时的北平——北方文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,鲁迅、茅盾都有文章寄来,一时轰动了北方文坛"[④]。尽管《文学杂志》和《文艺月报》不是长期刊物,但它们却是北平左联纠正"左"倾错误最初的文艺实践,也是左联为活跃北方文坛率先推出的杂志,其积极作用不容忽视。

三、南北左翼的联合:以办刊的方式重振北方文坛

自《文学杂志》《文艺月报》起,"'北平左联'通过刊物的筹备,就开始纠正过去关门主义的孤立倾向"[⑤]。有左翼背景的、更具包容性的文学刊物在北方文坛陆续出现。《文史》杂志于1934年4月出版,编者是中国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承仕,撰稿人有鲁迅、周作人、吴文祺、赵景深、俞平伯、黎锦明、蹇先艾、臧克家等。杂志就如其名称那样,分为史学和文学两大板块。《文史》"史学"部分之目的在于"把握着正确的史学观,调整可靠的史实,发现它各阶段的下层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;并与世界史作比较研究而求其通性"[⑥]。史学方面的约稿,均由主编吴承仕负责,也正因此《文史》出现了大量在平大学教师的文章,既使杂志整体的学术水准得到提升,也使其逐渐成为左联团结北平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载体,这也是该刊最难得之处。《文史》"文学"部分亦不刻意突出其左翼色彩,立志在"不逆流""不反动"和"不为某方面之代言人""不为某阶级之说教者"的条件之下发展文艺。[⑦] 文学方面由王志之负责组稿,除采用北平左联青年作家的稿件外,王志之还向鲁迅索来稿件《儒术》,并通过鲁迅向上海的左翼作家如茅盾等人约稿。《文史》的进步倾向引起上海左联刊物《文学》的注意,曾评价《文史》的创刊号:"很有几篇值得我们一谈的作品。"[⑧]

此外,左翼作家王余杞编辑的《当代文学》于1934年7月1日在天津创刊。这份杂志也延续了相近的办刊方式:虽为北方左翼刊物,但也发表大量上海作家作品。《当代文学》在第一卷卷末的《编后》中说明:"本刊既不属于任何党或者派,也并没有门户之见。"分析该刊作家群的组成,如聂绀弩、宋之的、

① 编者:《编后》,《文学杂志》,1933年一卷一号。

② 陈北鸥:《回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的艰苦斗争》,《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》,北京:北京出版社,1991年版,第313页。

③ 编者:《编后》,《文艺月报》,1933年一卷一号。

④ 陈沂:《1931—1932年的北方左翼文化运动》,《左联回忆录》(下)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2年版,第577页。

⑤ 陆万美:《忆鲁迅会见北平左联的同志》,《鲁迅生平史料汇编》第3辑,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1983年版,第579页。

⑥ 编者:《编辑後记》,《文史》,1934年一卷一号。

⑦ 编者:《编辑後记》,《文史》,1934年一卷一号。

⑧ 苏欣:《笔讯·北平》,《文学》,1934年三卷一号。

叶紫、艾芜、邱东平、芦焚、李辉英、徐盈、澎岛、白薇、陈白尘、蒲风等基本都是立场左倾的作家。但综观全部五期《当代文学》，其刊登的作品左翼色彩并不鲜明，且大都显示左翼文学创作的进步和成长。

作为北方左联的主要负责人，陆万美曾于1933年初赴上海与中国左联交流北方左联的工作情况，直到三月中才返回北平。他通过鲁迅、聂耳，见到了阳翰笙和周扬；在艾芜和雷溅波的住处，见到了丁玲和沙汀。“这时，上海已在反左倾关门主义，他们都着重谈了这方面的情况，并对今后工作中加强联系说了一些意见”①。返回北平后，陆万美传达了上海左联反“左”倾的情况，左联常委还专门对此开会讨论，在那之后工作“酝酿着新的改变”，北方左联逐渐打开过去关闭的大门，无论是办刊还是开展工作的方式都有所调整。总之，北方文坛由萧寂的景象到逐步的繁荣，既有北平学院派文人的贡献，也有北方左联的功劳，不应当只由“京海”两派的论争中，沈从文以底气十足的“京派”面目亮相就作出简单判断：因为“京派”属于北方文坛，就认为北方文坛只有京派。事实上，北方文坛繁荣的面貌是北方左联团结各派作家首先推动的，北方文坛的繁荣是多方面的。

众所周知，上海是当时的文坛中心，文学氛围空前活跃，鲁迅作为左联“盟主”坐镇上海，上海左联的文学活动自然吸引众人瞩目，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化的压制虽从未停止，但上海的租界在保存左翼力量方面拥有着优势。而北方左联既要在萧寂的北方文坛，通过办刊活跃文学空气，又要躲避当局的搜查禁封，还要尽其所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艺工作者，这使北方左联开展文艺工作的难度，远超上海左联。

长期以来，学界对北方左联的研究，重其政治活动多过文学活动，北方左联的成员更多被认为是政治活动家而不是文学家，因此认为北方左联在发展北方文艺方面极少贡献。其实，1932年以后北方左联的文学活动，不再是“旗帜鲜明”地以斗争方式开展，那样的工作方式已被认为行不通。北方左联逐渐打开大门，到后来与非左翼作家联合，共同营造北方文坛的繁荣，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形式与内容的转变，还表现在团结北方非左翼作家共同办刊，合力推动北方文坛的重振。

《文学杂志》《文艺月报》等左翼刊物的创办，是北平左联纠正文艺路线“左”倾错误之初步实践。1934年1月，郑振铎、靳以编辑的《文学季刊》在北平面世，这份杂志看似“京派”刊物，实际上，在其创刊之初就通过郑振铎、靳以与上海左联刊物《文学》建立起互通有无的紧密联系，暗含着潜在的左翼立场。而《水星》作为《文学季刊》的副刊一开始就与《文学》《文学季刊》的作家群，保持着较好的文学互动，又因为它并不鲜明的政治色彩，成功地团结了北平的学院派。② 因此，结合南北两地左翼期刊的创办过程及编撰群体的文学行为来看，左翼文学对内的自我调整、对外的寻求团结，为促发北方文坛的重振、增进文坛各派的团结与理解、壮大左翼文学的力量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。

（责任编辑：素微）

① 陆万美：《迎着敌人的刺刀尖，坚持战斗的“北平左联”》，《左联回忆录》（下）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2年版，第607页。

② 《文学季刊》及其后续刊物以潜在的左翼立场和包容的姿态，持续推进1930年代文坛生态的逐步好转。相关论述可参见拙文《走向开放包容的左翼文学阵营——〈文学季刊〉及其相关刊物考论》，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，2018年第3期，第180－195页。